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科升维：从价值重估到范式再造

张梦起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面对人工智能引发的深刻变革，人文学科并非走向消亡，而是迎来了一次“升维”的契机。这一转型并非单一维度的应激反应，而是在伦理、方法与认知三个层面展开的系统性重塑。在伦理维度，文科正从技术应用的被动批判者，升维为人工智能治理与价值对齐的主动领航员；在方法维度，以“数字人文”为代表的新范式，正通过计算方法与数据科学重塑研究疆域，实现从微观精读到宏观洞察的跨越；在认知维度，文科的核心议题正从孤立的“人”转向人机共生的“认知生态”，旨在理解和建构全新的主体性与世界图景。这一系列升维不仅重估并确证了人文学科的时代价值，更将其定位为塑造以人为本的智能未来的核心力量。

关键词：人工智能；文科升维；数字人文；技术伦理；认知生态

DOI：10.69979/3029-2727.25.09.048

1 危殆与自省：“有用性”焦虑下的价值回归

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将早已存在的关于文科“有用性”的争论，骤然升级为一场关乎其未来命运的“生死劫”之忧。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代码、音视频等多模态内容上展现出超越普通大众水准的能力，这种前所未有的技术冲击，与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以就业和收入为标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相叠加，共同放大了人们对文科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然而，这场看似危机的挑战，实则为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返璞归真、深刻自省的契机，迫使其超越表层的“有用性”辩护，回归并彰显其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在探讨如何“升维”之前，必须首先稳固其存在的根基。

对这场危机的回应，核心在于辨识并坚守那些无法被计算逻辑所还原的人类独有特质。哲学家陈嘉映对此作出了精辟的区分，他认为人工智能的特长在于“无感的理知”，而人类的独特优势则在于“有感之知”。这种“有感之知”强调真正的理解与认知无法脱离身体的感知与情感的卷入，其根本在于“连着理解自己来理解世界，连着世界来理解自己”。这一哲学论断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学者郁建兴指出，人工智能可以生成优美的诗句，但无法真正理解晏殊笔下“似曾相识燕归来”所蕴含的复杂情感与文化意涵。燕子在此处不仅是一种鸟类，更是在人类独特文化认知中承载着春天、希望与归属感的符号，这种意义世界的构建，恰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功能，也是纯粹的算法和数据处理所无法触及的。

更进一步，人文学者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学术产出中，更内化于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存在姿态。面对一个试图将万物还原为可计算、可操控的“持存物”的智能时代，人文学者所坚守的风格化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对抗计算”的力量。这种风格源于对历史纵深的感知、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广泛涉猎所形成的“历史感”与“博雅气象”，并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重感性，不过度信任纯粹理性，相信对微小事物的触动比高速心算更值得赞赏；其二，基于身体性，通过模糊而丰富的中观体验丈量世界，以保留世界的“灵晕”；其三，秉持理想主义，坚信世界无法被完全逻辑化，并始终在“此岸”与“彼岸”的张力中眺望价值与意义。这种深植于感性、身体与理想主义的生存方式，构成了对人工智能理性霸权最深刻的回应，也为人文学科在智能时代的“升维”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座。

2 伦理升维：从技术批判者到价值领航员

如果说价值自省是文科应对挑战的防御性姿态，那么在伦理层面的升维，则是其主动出击、重塑技术走向的进攻性策略。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从一个仅仅对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滞后批判的旁观者，演变为一个主动参与技术设计、构建伦理框架、引领价值方向的领航员。这一升维的核心在于确立人文的主体性地位，正如学者王博岳所言，关键在于回答“‘谁为主体’”。人工智能应是人文精神的延展工具而非替代者”。

这一领航角色并非空谈。学者张端鸿明确指出,“文科不仅应该用 AI 拓展边界,也应为 AI 注入判断力与温度,使技术更懂人、更向善”。这意味着人文学科的使命是确保技术的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福祉。这种理念已经成为全球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便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它确立了以“人权和人类尊严”为核心的价值观,并强调了“人类的监督和决定”以及“责任和问责”等关键原则。这些国际准则的制定,本身就是人文精神介入并塑造全球科技治理的体现,为人文学科的伦理升维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依据。

从哲学层面看,这种人文引导的必要性根植于人工智能的本质。信息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提出了一个关键论断:人工智能拥有在特定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动性”(agency),但它本身并无真正的智能、意识或理解力,其智能为“零”。他将人工智能的现状描述为“成功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动性)与拥有智能才能做到这一点(智力)之间的脱节”。这种能动性与智力的分离,使得不受人文价值引导的纯粹能动性充满了潜在风险,因此,人类的伦理监督与价值注入便成为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人文学科的伦理领航作用,更体现在应对前沿技术所带来的全新挑战上。学者段伟文对“AI 复活”与“数字生命”等现象的探讨,便是一个深刻的例证。这项技术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挑战着人类关于记忆、尊严、身份认同乃至生命本身的根本观念。这些复杂的问题无法通过技术或法律条文简单解决,而必须诉诸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深层思辨。段伟文将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视为一场“结果未知的社会伦理试验”,而人文学者正是这场试验中不可或缺的设计者与观察员。从被动适应技术到主动建构规范,从外围批判到核心引领,这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文科伦理角色的根本性升维。

3 方法升维:“数字人文”驱动的研究范式再造

除了在价值与伦理层面的角色重塑,人工智能时代同样为文科学术研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升维。这一升维的核心驱动力是“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兴起。真正的“新文科”并非“文科+代码”的浅层拼接,而必须是“‘人性智慧×技术赋能’的深度

融合”。这种融合正在催生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它超越了传统人文研究的局限,使其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探索知识。

这一范式转型,意味着从“作为技术方法的数字人文”向“作为研究范式的数字人文”的深刻转变。前者仅仅将数字工具视为提升效率的辅助手段,而后者则意味着研究的根本逻辑、提问方式乃至知识生产过程的全面再造。这一新范式建立在学者杨庆峰所分析的数字化三重内涵之上:计算化,将人文对象转化为可分析的数据;虚拟化,创造出新的数字存在物;图像可视化,以全新的图示方式揭示内在联系。这些不仅仅是技术操作,更是重构人文知识图景的新途径。

这种方法论升维的潜力,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已得到充分展现。在文学研究领域,计算语言学方法的引入,使得研究者能够超越个体精读的限制,进行大规模文本分析。例如,针对《红楼梦》作者归属这一经典“红学”公案,研究者通过对小说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用字量、高频词、类符/形符比(TTR)等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为作者身份的辨析提供了全新的量化证据。同样,对《全唐诗》和《全宋诗》的大规模词频分析,揭示出“唐诗偏重空间,而宋诗偏重时间”的宏观风格差异,这种洞察是传统阅读方式难以企及的。

在历史学领域,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同样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献与地图,而是能够创建动态的、多图层的时空叙事。中国人民大学赵秀荣教授的获奖研究项目,便是利用 GIS 技术绘制 19 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霍乱的传播地图。通过将流行病学数据、地理信息与社会历史文献相结合,该研究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动态呈现疾病的传播路径及其与社会因素的复杂关联。这种方法使得研究者能够在一个“宏观视角”下,通过追踪海量个体的时空轨迹来重构文化历史的演变。数字人文的实践,完美地解决了传统人文学科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长期存在的张力。它并非以冰冷的数据取代温润的阐释,而是形成了一种“远读”(distantreading)与“近读”(closer eading)之间的良性循环: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定量)可以高效地发现异常模式或提出全新问题,而这些问题继而需要研究者回归文本,进行深入的、情境化的阐释(定性)。这种计算能力与阐释深度的结合,正是文科

方法论升维的精髓所在。

4 认知升维：迈向人机共生的新认知生态

人工智能时代为文科带来的最深刻、最前沿的升维，发生在认知层面。这要求人文学科将其研究的核心对象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扩展：从聚焦于孤立的“人”及其造物，转向探索 and 理论化一个全新的、人与机器共存共生的“认知生态”。这不仅是对研究领域的拓展，更是对“何为认知”、“何为思考”等根本问题的重新审视。

这一认知转向的理论基石，可以追溯到后人类主义思想家 N. 凯瑟琳·海尔斯 (N. Katherine Hayles) 的开创性工作。在其著作《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中，海尔斯批判了将信息与物质载体相分离的二元论，主张将人视为一个“异质成分的集合体，一个物质-信息实体”。这一观点为理解人与技术的深度纠缠提供了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海尔斯进一步提出了“认知组合”

(cognitive assemblage) 的概念。该理论认为，认知并非人类大脑所独有，而是分布在包括人类与人工智能在内的、相互作用的行动者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里，人工智能拥有其自身的“环境界”(umwelt)——一种独特的、由其算法和数据结构所决定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它与人类的“环境界”相互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

海尔斯甚至持有一种“少数派观点”，认为大型语言模型不仅仅是随机的序列生成器 (stochastic parrots)，而是在其庞大的数据关联网络中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推断”。这一极具启发性的观点，将人工智能重新定位为一个非人类的认知伙伴。这意味着，理解人工智能的关键，不再是简单地评判其输出的“对”与“错”，而是要学会像解读异文化文本一样，去理解其独特的认知模式与“思维”方式。

因此，文科在认知层面的升维，其核心使命便是成为研究这一新兴认知生态的主导学科。这要求文科超越传统的人与工具的二元对立框架，深入探索在海尔斯所说的“技术发生”(technogenesis)过程中，人类自

身的认知官能(如注意力、记忆、感知)是如何被技术所重塑的。研究的对象，也从单纯的人类文化产品，扩展到由“人-机认知组合”共同生产出的新文化形态——新的知识、新的艺术、新的社会关系。这种认知层面的变革，甚至要求社会理论的更新。传统社会理论往往将人工智能视为“人意志的外部延伸”，而新的理论，如“信息行动”理论，则尝试将非人行动者纳入社会分析的框架，认为它们可以成为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了对社会互动的理解。

最终，文科的认知升维完成了一个深刻的自反性回归。当机器开始执行曾经被认为是人类专属的认知任务时，人文学科被推向了前沿，去追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认知究竟是什么？”。这使得人文学科的定位，从研究人类思想的产物(文学、历史、艺术)，升维为在一个全新的技术语境下，研究思考本身的过程与本质。在一个智能与意识逐渐分离(如弗洛里迪所论)、认知能力日益分布于人机网络(如海尔斯所言)的时代，人文学科成为了理解这一全新现实、确保人类在构建新智能的同时不失却智慧的、不可或缺的核心学科。

参考文献

- [1] 王晓光, 肖思汉, 陈静. 数字人文: 一种新人文研究范式[J]. 图书情报知识, 2017(5): 14-23.
- [2]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人工智能通识教育(AIGE)研究中心, 等. AI 融合高等教育: 从通识到专业——学科+AI 人才培养白皮书. (2024-05-28) [2024-06-15].
-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 (2021-11-23) [2024-06-15].
- [4] 李成林, 肖可以, 黄凯健, 等. 欧美高校历史类数字人文项目探析[J]. 文献与数据学报, 2022, 4(1): 107-118.

作者简介: 张梦起, 男, 汉, 河北省石家庄市,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